



华中村治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贺雪峰

老年人危机与家庭秩序

家庭转型中的资源、政治与伦理

李永萍 著

THE ELDERLY
CRISIS AND FAMILY ORDER

THE RESOURCES, POLITICS AND
ETHICS IN FAMILY TRANSFORMATION



华中村治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贺雪峰

老年人危机与家庭秩序
家庭转型中的资源、政治与伦理

THE ELDERLY
CRISIS AND FAMILY ORDER
THE RESOURCES, POLITICS AND
ETHICS IN FAMILY TRANSFORMATION

李永萍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年人危机与家庭秩序：家庭转型中的资源、政治与伦理 / 李永萍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0

(华中村治研究丛书)

ISBN 978-7-5201-2187-3

I. ①老… II. ①李… III. ①农村-社会变迁-研究-中国 IV. ①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6565号

· 华中村治研究丛书 ·

老年人危机与家庭秩序

——家庭转型中的资源、政治与伦理

著 者 / 李永萍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任晓霞

责任编辑 / 任晓霞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出版中心(010)59367159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9.25 字 数：279千字

版 次 /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187-3

定 价 / 7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华中村治研究丛书”总序

2002年发表《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一文，我们提出了村治研究的三大共识，即“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这三大共识是华中村治学者多年研究所形成的基本共识，一直以来也指导着华中村治学者的研究实践。

“田野的灵感”强调华中村治研究中的经验优先原则。当前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巨大变革时期，经验现象十分丰富，从经验中来，到经验中去，以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作为出发点和归属，在理解经验与实践过程中形成对经验与实践的解释，是华中村治研究的显著特征。

“野性的思维”强调华中村治研究中理论与方法的多元性。只要有利于增加对经验与实践的理解，任何理论与方法都是好理论和好方法。正是在用各种理论与方法来理解和解释经验与实践的过程中会形成各种提炼与概括，会形成基于中国经验与实践的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野性的思维”另外一层含义是，不拘一格，大胆假设，不怕出错，敢于探索。

“直白的文风”强调华中村治研究要能容纳多学科、经验性与原创研究的特点。经验研究看起来没有进入门槛，真正深入进去却需要长期积累和学术功力。“直白的文风”反对雕刻文字、闭门造车，注重想事说事，注重研究向大众开放，注重多学科研究对话。开门搞研究而不是关门自我循环，是华中村治学者的一个基本准则。



中国是一个大国，有 5000 年文明，14 亿人口，陆地国土面积 960 万平方公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 GDP 已是世界第一。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时期，农村人口迅速城市化。中国正由一个传统国家变成一个现代甚至后现代的国家。如何理解巨变中的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历史，在这个理解与解释的过程中形成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并转而指导实践和改造实践，就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伟大使命。

立足中国经验和实践的中国社会科学一定是伟大的，是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是饱含中国民族性和地域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改善我们观察和理解实践的视野，而不是屏蔽我们的视野。脱离中国实践的语境，套用没有经过中国实践注解和浸泡的西方理论，往往不仅不能改善我们的视野，反而可能屏蔽我们的视野。只有真正进入经验与实践，我们的理论才有还原经验与实践的能力，才能改善我们观察和理解经验与实践的视野，真正理解实践和改造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是在理解和解释伟大的中国经验与实践中产生的，是服务于中国实践并以中国实践来检验的。这样一种从经验中来一形成理论提炼与概括一回到经验中去的社会科学研究循环，就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大循环。只有在这样的大循环中，中国社会科学才能选择正确的研究方向，研究也才能获得丰富的中国经验与实践的滋养，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循环过程中产生的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才具有生命力。有了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的大循环，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就必然会有从理论出发一到经验中去一再回到理论的以学术对话为特点的小循环，这样一种小循环是服务于和服从于中国社会科学大循环的。

要在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与实践的大循环中建立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就必须要有真正做中国经验研究的学者。这些学者要有充分的经验训练，要在长期经验调查中形成对经验的总体把握能力，要有“经验质感”，不仅要能从经验中提炼出理论命题，而且要有将理论还原到经验中的能力。

获得经验质感的不二法门是进行饱和经验训练，不断地到经验中浸泡，

具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具有将经验碎片整合起来的能力，真正形成想事的能力。饱和经验训练尤其要防止对经验的一触即跳，即仅在经验中产生了微弱问题意识就脱离经验去做精致“研究”。正是通过饱和经验训练，才能利用各种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经验，才能将经验研究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理论化的概括，才能为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添砖加瓦。

十数年来，华中村治研究所追求的，就是建立在饱和经验训练基础上的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的事业。这个事业从理解和解释经验与实践开始，又回归经验与实践，中间留下的理论提炼与概括正是建设有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所需要的砖瓦。

二

最近十数年来，我所组织的华中村治研究团队每年驻村调研时间都超过了4000个工作日，平均下来，我们研究团队每天都有10人以上在全国各地农村调研。某种意义上，我们团队同仁都是经历了饱和经验训练的。

从时间上看，我们在取消农业税前的20世纪末期开始农村调研，到现在国家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2000年时中国城市化率只有36%，现在中国城市化率已近60%，几乎所有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进城了；从地域上，我们不仅在南方中国、北方中国和长江流域调查，而且近年密集地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贫困地区调查，发现了南北中国、东西中国和中国腹地的巨大区域差异；从研究主题上，我们从基层政治研究开始，进入对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研究，再延展到对几乎所有乡村主题的研究上，比如家庭制度、农业发展、宗教信仰、土地制度、乡村教育、医疗保障，等等；近年来我们的研究也跟着农民工进城，开始城市社区、街头治理、信访制度、地方治理等方面的研究。

我们希望在调查和研究中，能做到从经验中来，到经验中去，真正从经验中得灵感，依靠经验形成“想事”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形成若干理论提炼与概括。



十数年来，我们研究团队在饱和调研基础上形成了大量理论概括，这些理论又作为视角参与到政策问题的讨论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政策产生了影响，比如对农业、土地、信访、乡村治理、城市化等方面政策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团队坚持下去，再坚持十年、十数年，我们就一定可以形成理解中国经验的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学科一家之言。我们希望中国社会科学有百十家这样的一家之言，我们呼吁各种一家之言良性竞争，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共同发展，最终成长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适应的高水平的中国社会科学来。

我们计划在未来七八年时间将我们团队的最新研究纳入“华中村治研究丛书”出版。希望丛书能增加读者对华中村治研究的了解。

是为序。

贺雪峰

2018年4月10日晚

代 序

学会做老人？

说说我的父母亲，以及他们这一辈的普通老人们吧。

2017年春节回乡期间，家人团聚甚是热闹。母亲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又要做家务，又要照看小孩，歇下了还要到两个儿媳妇的房间说上几句话——她在为子女们营造宾至如归的氛围。而父亲还是像往常一样和客人喝茶聊天，过他的“个人生活”。他似乎是家庭生活中多余的角色，家务事插不上手（实际上也不会做），连吃饭时间也被安排着。小孩调皮，虽是童言无忌，但有些话总归是不好听，却也只能忍着。

我父母均已年近古稀，却开始悟出些人生道理来。母亲谈家事时，经常会说出“要学会做老人”的话来。这大概是母亲和她的妯娌们经常在一起体味出来的道理。细嚼起来，此话大概有两个意思：一是要“服老”，子女大了，该交权的交权，并且交权要彻底，哪怕看不惯，也不要干预；二是要学会“忍”，只要有吃有喝，对子女就不应再要求太多。就如母亲“教育”父亲时常说的话：“难不成（子女）还要（把老人）当皇帝供起来不成？”

偶尔，父亲很是不服，回敬母亲说：“那我生儿子来干吗？”20世纪七八十年代，父母生了我们兄弟姊妹5人——我妹妹是母亲结扎以后意外有的，我排行老四，是家中的第二个男孩。当年，父母大概真的是秉持了“多子多福”的观念吧。在我小时候，爷爷辈的那些老人们多少还是有“当皇帝”的感觉的。母亲、伯母和婶婶们聚在一起时，不时会聊起爷爷“闹



分家”的过往。本来，爷爷是随着我父母生活的，但自从我降生后，我家的生活水平就比大伯家低一些。于是，爷爷就闹着要跟大伯家过。大伯母当然不愿意。但爷爷极其强悍，买了几把锁将我父亲兄弟几家的厨房门都锁住，宣称，“我没饭吃，你们也别想有饭吃”。大伯母见状，只能缴械投降。并且，爷爷在大伯母家也是一如既往，逍遥自在，每天带着我这个小孙子到各家串门、游玩，给我买好吃的。

谁能想到，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打工潮”的兴起，中国农民家庭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动。我的兄弟姊妹们都想尽办法“进城”，他们虽未能在城市立足，但也能将城市作为谋生之地。父母亲或许未曾料到，生了5个子女，末了，年纪大了，反而成了“孤寡老人”。母亲“觉悟”得早，总是安慰在外的我们，她很好，也会照顾好父亲，我们放心就是了。只是，偶尔打来电话，要是我和妻子没接到，便会心急如焚地把电话打到我的兄弟姊妹那里，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是牵挂吧！父亲却一直难以接受这一现实。按我大姐的说法，父亲这些年的脾气越来越古怪，“老年成细仔”。

前几年，事有凑巧，我连续两年未回家过年，而是改在暑假回家探亲。父亲莫名其妙地对我发了一顿脾气，说我是个不孝子。当时的我颇感委屈，和他争执一番：我以为自己做得还不错，二老在家衣食无忧，平常嘘寒问暖也算尽心，我几个兄弟姊妹也极为关照他们，内心觉得他们应该知足才是。再说，我又不是故意不回家过年，凭什么这样说我？可是，这一争执，反倒将他的情绪调动起来，从他年轻时受到的苦，到现在生活中受到的各种委屈，他声泪俱下地一股脑儿倒出来。我从未遇到这种情况，甚是震惊。隔日，父亲又如往常，似乎这件事就没发生过。

细想起来，父母亲和他们的同辈人遭遇的尴尬，也许是史无前例的吧？父亲习得的老年生活经验是像我爷爷那样的，一大家人居住在一起，天天吵吵闹闹，没完没了。何曾想过，相聚也会变得如此不易？

我和大哥都是在各自生活的城市结婚生子的，父亲母亲根本就没有跟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一起生活过。家庭空间的重构，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失去了习得现代家庭生活经验的机会。多年前，大哥大嫂邀请父母亲去城

里住一段时间。母亲倒是住得习惯，每天帮忙操持家务、带孙子孙女。但父亲却觉得很不适应。他多年已经养成了诸多嗜好，一日三餐要喝酒，闲下来烟不离手、茶不离口，在狭窄的城市居住空间里，根本就不适合。不用说别的，仅仅是幼小的孩子就不太能适应屋里烟雾缭绕。于是，过了一段时间，不仅父亲不适应，连大哥大嫂也不适应。前两年小孩出生后，我和妻子也邀请父母到我们生活的城市来生活一段时间。父亲很注意生活细节，抽烟时也到阳台上去。可不小心，烟灰掉到了楼下，引得邻居敲门提醒，他感到很是尴尬。

这些细节，虽不是事，却也足以引起父母亲的警觉。我曾经开玩笑似的建议父母亲，要是他们愿意，干脆跟我们住一块算了，但两人都断然拒绝。千万不要和子女长期生活在一起，这几乎是父母亲这一辈老人的共识。母亲经常会跟我说，某某的儿子儿媳都很孝顺，可真住在一起了，最终还是不习惯。她举的例子，有些她有切身体验，有些虽无体验却可想象得出来。那些看似是生活习惯的问题，其实是代际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关键在于，无论是老人，还是子女，其实都很难再有动力和条件去彼此适应。久而久之，连在家的老人也渐渐避免和子女同居共处。

那些还和子女住在一起的老人，更要习得如何做老人。到了一定年纪，老年男子就主动戒烟戒酒，老年妇女就不再管家。公开的原因多是身体不允许，但细究起来，恐怕没那么简单。当老人们还未放权时，不良嗜好及家庭时间安排是一种权力，儿孙们得适应。可问题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一旦老人们放权，就得适应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而儿子儿媳们却在培养新的特权，比如打牌赌博，一日三餐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早上睡懒觉……哪怕是过年期间，再怎么看不惯，“聪明”的老人都会将就着。因为，他们知道，相聚不易，相处更难。一旦发生代际冲突，这一辈的老人，可没有我爷爷当年的那份“豪迈”。

想来，父母亲这一辈老人，多数已经“学会如何做老人了”。至少都学会了“服老”，学会了“忍”。父亲前几年还发脾气，但只能在儿子面前发，现在在我面前没脾气了——毕竟，我们之间相处的机会也不多啊。也是，



不学会做老人又能怎么办呢？按母亲的口头禅，人要认命！

是啊，他们主动或被动地学会做老人，是命运使然，也是时代要求。过去，主要是子女要学会做子女，并且是首先向父母亲学习如何过日子。老人日子若是过不好，人们多半认为是“不孝子”、“恶媳妇”造成。而今，谁会这么认为呢？连我父亲和母亲都认为，不能怪子女，子女也是没办法——我刚换工作，其实工作环境是变好了不少的，可我母亲听说新单位那片房价太高，整天担心我没房子住，每次通电话都说她和父亲还有生活费，不用寄钱。言下之意是，节省一点钱买房子吧。

父母亲这一辈老人为子女着想的做法，与城市化这个滚滚洪流竟然有高度的契合之处。他们虽不一定有能力支持儿女们实现城市梦，却都愿意为此牺牲自己，包括物质、情感、相处，等等。这个体验，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汹涌澎湃。这个过程，我的祖父辈没有，将来我们老了估计也不会再有，只有父母亲这一代老人有。理解他们，就是理解这个时代。

李永萍博士的这本书，恰恰为理解当代中国的老年人危机提供了深刻而独到的视角。相信看过这本书的读者，都会理解我讲的故事。

是为序。

吕德文

2018年5月2日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及缘起 _ 003
- 第二节 老年人问题与家庭转型 _ 005
- 第三节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_ 022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核心概念 _ 028
- 第五节 田野与方法 _ 033

第二章 现代性、家庭再生产与老年人危机

- 第一节 家庭再生产的基本要素 _ 043
- 第二节 现代性的实践形态 _ 049
- 第三节 家庭再生产的模式转换 _ 059
- 第四节 老年人危机辨析 _ 063

第三章 恩往下流：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资源配置逻辑

- 第一节 简单家庭再生产的资源配置 _ 072
- 第二节 婚姻压力与资源集聚 _ 080
- 第三节 分家变异与资源输送 _ 089
- 第四节 任务绵延与无限责任 _ 104
- 第五节 有限反馈与底线生存 _ 118
- 第六节 小结：从“过日子”到“死奔” _ 131

第四章 权力整合：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政治过程

- 第一节 简单家庭再生产的权力格局 _ 136



- 第二节 婚姻主导权：权力主体的转换 _ 142
- 第三节 策略与委屈：权力关系的失衡 _ 153
- 第四节 排斥与边缘：权力关系的锁定 _ 165
- 第五节 做老人之道：权力规范的重构 _ 177
- 第六节 小结：去正义的家庭政治 _ 185

第五章 价值依附：扩大化家庭再生产的伦理重构

- 第一节 简单家庭再生产的价值模式 _ 190
- 第二节 发展至上：家庭动力的重构 _ 200
- 第三节 “为了儿子”：价值实现的悖论 _ 213
- 第四节 “废弃的生命”：未完成的价值之路 _ 223
- 第五节 小结：新家庭伦理 _ 232

第六章 老年人危机的本质

- 第一节 嵌入家庭再生产的“老化”过程 _ 238
- 第二节 老年人危机的生成路径 _ 239
- 第三节 老年人危机的属性 _ 248
- 第四节 “学会做老人”：农村老年人危机的本质 _ 255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第一节 功能性家庭的崛起 _ 259
- 第二节 功能性家庭与家庭转型 _ 266
- 第三节 家庭转型的伦理陷阱 _ 271
- 第四节 家庭转型的梦与痛 _ 274
- 第五节 家庭转型的时空定位 _ 277

参考文献

后 记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及缘起

在农村调研时，常常听到农民感慨，如今“媳妇成了婆婆，婆婆成了媳妇”。农民幽默而又略带自嘲的话语表达了他们对婆媳关系变迁的朴素感受。当前农村中都盛行谈论“好婆婆”的标准，“好婆婆”而非“好媳妇”的话语盛行的背后，凸显了媳妇的强势，婆婆的弱势。

婆媳关系是代际关系的敏感内容和重要标志，婆媳关系的颠倒折射出了当前农村代际关系的深刻变迁。近年来笔者在全国多地农村调研时发现，当前农村中代际之间发生直接正面冲突的情况越来越少，代际关系越来越呈现温情脉脉的一面，农村老年人似乎可以预期一个幸福的晚年。不过，随着调研的深入，才渐渐发现在温情的背后，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并不令人乐观。2014年初，在江汉平原农村调研时，当地老年人的生活状态深深地触动了笔者对老年人处境的理解和认识。“死亡”和“自杀”是在与老年人进行访谈时经常听到的词。尤记得访谈中遇到一个70多岁的老婆婆，她有三个儿子，现在老两口和儿子分开单过，主要靠自己种口粮田为生，当问及她今后的打算时，她随口说了一句：“真不行了，树丫子上挎着（上吊的意思）！”老年人对死亡的这种坦然心态和明确预期使笔者意识到，当前农村老年人关于生命、生活和价值的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然，自杀并非老年人危机的普遍表达方式。更进一步的调研发现，相对于自杀的极端行为，农村老年人面对家庭内外的压力普遍表现出克制和隐忍，他们在为子代的付出和操劳中，不断地赋予这种生活状态意义，从而形成了在外人看来温情与和谐的生活画面。笔者在感动于农村老年人的伟大乃至悲壮之余，觉察到在现代性进村和家庭转型过程中农村老年人所遭遇的深



层危机，这种危机在表面上看温和平静，实际上暗流汹涌。

当前农村日益普遍的情况是，老年人难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子代的供养，同时子代的冷漠也未能激起老年人的怨恨。老年人时常认为自己是子代家庭的负担与累赘，因而普遍持一种自我否定的生活态度。那么，老年人对自己存在状态本身的否定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该如何理解当前农村老年人的生活逻辑与生活状态？这些是本书探讨的问题。一般认为，老年人的境遇是家庭变迁的晴雨表。在传统家庭文化结构下，以家长制为基础的“长老秩序”标示着老年人的地位和威望。五四运动以来，在“冲决罗网”的革命口号下，中国家庭的现代转型逐渐开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性力量借助市场化和城市化等机制席卷农村社会，中国家庭的运行机制和实践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过日子”为核心的平和状态被打破，农民家庭越来越深地嵌入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这进一步促成了家庭动力学机制的改变，家庭内在的均衡性逐渐被打破，从而改变了“老化”的家庭脉络和“老年”的家庭地位。

纵向的代际关系是中国家庭关系最为重要的维度，也是理解老年人问题难以绕开的方面。传统社会中父母在儿子成婚之后逐渐成为子代的供养对象，子代对父代的及时反馈维系了中国家庭秩序的稳定，并且让老年人的家庭生活可预期、可持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在融入市场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了家庭经济收入的显著增长，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穷争饿吵”的家庭生活状态，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自养能力和生活质量，且国家出台的“新农保”政策也为农村老年人提供了一道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然而，正如笔者在开篇中提出的困惑，似乎养老问题的改善并不必然意味着老年人危机的消解。结合笔者在全国多地农村调研的情况来看，相对于农民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收入机会的增加，老年人的处境并不那么令人乐观：一方面，老年人普遍维持低度消费甚至“零消费”的状态，这是一种近乎保证基本生存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老年人则普遍表现出无所求于子代的生活态度。

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心作为养老对象的老年人，而且也要关心作为